

陈奂家抄本《管子》的版本价值

巩曰国

摘要：清代学者陈奂家抄本《管子》，其底本为今已不知去向的南宋蔡潜道墨宝堂本。抄本经陈奂反复校理后赠与高邮王氏父子，后由潘景郑收藏，今存上海图书馆。该抄本不仅为《管子》文本校勘提供了版本依据，亦可以作为校正墨宝堂本诸家传录资料的重要参照。

关键词：《管子》；陈奂家抄本；墨宝堂本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75-03

宋本《管子》，清代以来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有两种：杨忱本和蔡潜道墨宝堂本。杨忱本曾为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书舍、瞿氏铁琴铜剑楼、祁阳陈澄中收藏，今存国家图书馆。墨宝堂本《管子》也曾为黄丕烈收藏，此前该书收藏于任蒋桥顾竹君家，原缺13至19卷。黄丕烈从顾氏后人处购得，并据陆貽典校宋本补入所缺部分。此本后来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又归聊城杨氏海源阁，民国间归大连图书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版本后来竟不知去向。^①王欣夫称“蔡本流入东瀛”，^②郭沫若在给潘景郑的信中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③但这仅是猜测或传闻。半个多世纪以来，尚未有国人得见此珍本。值得庆幸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陈奂家抄本《管子》，就是依墨宝堂本抄录而成的。在见不到墨宝堂原本的情况下，这一抄本显得弥足珍贵。它不仅为《管子》文本校勘提供了版本依据，亦可以作为校正墨宝堂本诸家传录资料的重要参照。

一、抄本的形成与流传

陈奂（1786-1863），字倬云，号硕甫^④，晚号南园老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代著名学者，代表作有《诗毛氏传疏》等。陈奂家抄的《管子》，1函4册。卷1后有“瞿源蔡潜道宅 墨宝堂新雕印”双行牌记，卷末有“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双行牌记。此为墨宝堂本的最典型特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楹书隅录》、《藏园群书经眼录》均曾著录。据书后陈奂跋文，此本抄于道光九年（1829）九月，当时墨宝堂本在汪士钟艺芸书舍，陈奂“借抄颇费周折”，“出多金”方得以借录。从字体笔迹来看，抄本系由数名抄手分工抄录而成，书写不甚精到。这可能是限于时日而造成的。请人抄录完成后，陈奂用墨宝堂原本及黄丕烈校宋本、刘绩《管子补注》本对抄本进行了仔细的校理，并以不同符号分别标出。其跋文云：“既将原本对校一过，又从黄尧翁所藏校宋本对校一过。宋本与刘绩本显然误字，又将刘绩本略略校对一过。凡抄写之误字、脱字，每于本字之旁作‘ㄥ’以识之，凡云绩作某或云某字绩本有、某字绩本无，即作‘、’以识之，以示别焉。”抄本中此类甚多，如《枢言》“贤大夫不恃宗室”，“恃”原抄作“待”，以“ㄥ”标出，书眉写“恃”字；同篇“凡此七胜者贵众”，“此”字原抄脱漏，以“ㄥ”标出，书眉写“‘此’脱”。此为陈奂以墨宝堂原本校抄胥之误。再如《八观》“地四削，入诸侯，被也”，“被”字以“、”标出，书眉云“‘被’绩作‘破’”；同篇“民倍本而求外势”，“本”字以“、”标出，书眉云“绩本‘本’下有‘行’字”。此为陈奂以刘绩本校抄本。此后，陈奂又再次用墨宝堂原本和黄丕烈校宋本将抄本重校一过。跋文又云：“借尧翁校宋本阅毕后，又向汪姓重借原本《管子》与尧翁校宋本参互对校，有尧翁未尽校出而奂漫依改之者，今著之曰‘宋作某云’。此可见校书之难，精细若尧翁尚多遗漏如此也。奂又记。”抄本《法禁》“治事则不以官为王”书眉之“宋作

①参见笔者《宋本〈管子〉的收藏与流传》，《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2期。

②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74页。

③林申清《郭沫若遗札及其〈管子集校〉》，《图书馆杂志》，1999年第3期。

④此据陈奂弟子管庆祺所作《徵君陈先生年谱》，《清史稿·儒林传》作“字硕甫”。

收稿日期：2008-12-10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巩曰国（1971-），山东桓台人，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与传统文化。

‘王’绩作‘主’”之类，当为陈奂此再校时所书。

陈奂将墨宝堂《管子》抄本反复对校后，寄给了高邮王氏。道光九年陈奂致王引之的信中说：“所钞《管子》，实无妥便，迟迟未寄。邵鱼竹兄服阙来京，须十一月中到苏，可以托寄带呈无误。”^①年底，王引之收到陈奂抄校的《管子》，回信致谢：“兹连接手书二通并收到宋本《管子》钞本与尊校各条，极荷清心。雠校得免舛，感颂不可言宣。尊校各条，容度岁后仔细领会也。”^②陈奂曾问学于高邮王氏父子，与王念孙、王引之论学切磋，往来不绝。王念孙晚年校印《读书杂志》，曾嘱其代为抄校善本古籍多种，《管子》即其中之一。^③《三百堂文集》（乙亥丛编）中《跋赵本管子》所云“己丑（1829）九月，王怀祖先生属钞，乃向汪氏借录”，^④正是陈奂对抄校墨宝堂本《管子》的追记。

陈奂寄给高邮王氏的墨宝堂《管子》抄本，后来归潘景郑收藏。书前有“高邮王氏藏书印”白文方印，又有“吴县潘氏郑菴藏”朱文长方印。潘景郑对此抄本非常重视，在书后作长篇跋文详加介绍，并特别指出抄本“为蔡本（墨宝堂本）留一种子，宜更重视”。1956年，潘景郑曾将陈奂抄本寄给郭沫若参阅，抄本前郭沫若题辞即此时所加。郭沫若云：“余为《管子集校》，搜罗版本颇多，独墨宝堂宋本未见，引以为憾。此本即钞自墨宝堂本，并经陈奂手校，校录以遗高邮王氏，有铃印可证。潘君景郑远道惠假，得细阅一过，弥补遗憾，良堪感荷。原书本缺13卷至19卷，黄丕烈曾据陆貽典校宋本补入，俾成全帙。此钞本即据黄所校补本，而陈复曾以刘绩补注本对校。此可见前人之勤，用心之仔细。陈氏校过后，转赠王氏，曩时学者间友谊之敦厚，足令人感动。凡此均足师法，固不仅为学术研究增添一份善本而已。潘君实善体前贤之懿行者。谨志此数语璧还，用申谢意。1956年9月9日郭沫若。”可惜的是，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录入此本之内容。后来，潘景郑先生将抄本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化私为公，使我们得以睹见这一珍本的面貌。

二、抄本可校正《管子》其他版本

陈奂家抄本《管子》，辗转数家，不仅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留下一段学林佳话，实为幸事。抄本抄写虽不甚精，但经过陈奂的精心校理，又有名家印信题跋，自不同于寻常俗本。抄本经陈奂用墨宝堂原本一校再校，虽不能说完全等同原本，但文字上应基本可信。在目前情况下，此抄本可以作为《管子》文本校勘的重要依据。

《管子》版本，以宋代杨忱本为最古，以明代赵用贤《管韩合刻》本最为通行。清代学者曾以墨宝堂本校正赵用贤本之误，如王念孙《读书杂志》：“（《霸言》）‘百马伐之’，‘伐’当依宋本作‘代’。代，迭也。言以骥之材，而百马迭与之逐，则骥必疲也。‘强最一伐’，‘伐’亦当依宋本作‘代’。言强为一代之最，天下共伐之，则国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诸‘伐’字而误。”^⑤杨绍和《楹书隅录》亦曾举出墨宝堂本订正赵本之误处24例。但没有人将墨宝堂本与杨忱本这两种宋本《管子》进行对校。今墨宝堂本不可得见，仅抄本传世。现以抄本与杨忱本比较，以见其校勘价值。

将抄本与杨本对照，联系上下文，可发现杨本诸多误处。如：《权修》“是以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五辅》“臣不弑君”，杨本“弑”均误作“杀”；《幼官》“慎号审章，则其攻不待权舆”，杨本“权舆”误作“权与”；《大匡》“吾不早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杨本“今”误作“令”；《戒》“必则朋乎，且朋之为人也……”，“朋”即隰朋，杨本误作“明”；《轻重丁》“丁、惠、高、国”，“丁”指“丁氏”，杨本误作“下”等。抄本与杨本书后均有张嶠《读管子》，杨本中所云“后而读者累月”、“参以经史刑政”，文义不通。对照抄本可知“后”为“伏”之误，“刑政”为“训故”之误。读作“伏而读者累月”、“参以经史训故”，文义始明。《楹书隅录》称墨宝堂本“其中佳处，足正各本谬者实多”^⑥，非为虚语。

抄本与杨本的异文还有一些，如：《幼官图》“骄君使疲民则国危”，杨本“国危”作“危国”；《枢言》“霸术积于将士”，杨本“将”下有“战”字；同篇“人心之悼”，杨本“悼”作“悍”；《法禁》“营其名而后止矣”，杨本“营”作“荣”；《重令》“凡右国之重器”，杨本“右”作“君”；《兵法》“远用兵则可以必胜”，杨本“则”作“而”；《小称》“我托可恶，我托以来美名，又可得乎”，杨本作“我托可恶，我托可恶，以来美名，又可得乎”；《明法解》“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杨本“长短”作“短长”；同篇“是故忘主私伎以进其誉”，杨本“私”作“死”；《乘马数》“此齐地而功”，杨本“地”作“力”；《国准》“猛兽众也”，杨本“猛”作“禽”；《轻重乙》“破其君兼其地而虏其众”，杨本“众”作“将”等。这些地方虽不能说抄本胜于杨本，但可作为《管子》文本校勘的重要参考。

当然，抄本与杨本相比较，也有一些脱误之处。其最典型的脱漏是《权修》篇中，杨本“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

①《陈奂致王引之书》，见《昭代经师手简二辑》，1918年影印本。

②《王文简公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

③参见柳向春《高邮王氏父子与陈奂往来函件略考》，《白云论坛》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④《丛书集成续编》第134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612页。

⑤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450页。

⑥杨绍和《楹书隅录》，《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481页。

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抄本作“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大义，不可得也”，脱中间 40 字。此外如《幼官》“养之以德则民合”，抄本脱“德”字；《四称》“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抄本作“仲父已语我其恶”，脱“善而不语我其”6 字；《明法解》“故明主之治也”，抄本脱“主”字；《山权术》“桓公曰何谓决塞”，抄本脱此 7 字等。抄本的误文多形近而致误，如：杨本《五辅》“不忘于后世”，抄本“忘”作“志”；《宙合》“攻于一事者”，抄本“攻”作“政”；《小匡》“令不得迁徙”，抄本“令”作“合”；《霸形》“日杀数十牛者数旬”，抄本“牛”作“年”；《戒》“则乱自此始矣”，抄本“始”作“如”；《侈靡》“众而约”，抄本“约”作“纳”。黄丕烈曾评价墨宝堂本“非最善之本也”，^①从抄本与杨本的比较来看，不为无据。

三、抄本可校正墨宝堂本诸家传录资料

清代一些学者曾据墨宝堂本校《管子》其他版本，又有学者据校本过录。这些校本及过录本是墨宝堂本的重要资料。但因难以见到原本，诸家辗转传录，不免产生诸多讹误。将抄本与传录资料比照，可发现其中的问题。今以陈奂校本及其传校本为例说明。

陈奂校本今存国家图书馆，所用的底本为赵用贤《管韩合刻》本。书前题“陈硕甫先生用宋本校”，书后有冒广生跋，称其为“陈硕甫以宋瞿源蔡氏刻《管子》校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则前人多以其所用校本为墨宝堂原本。不过，将陈校与抄本比照，我们发现其中有些与抄本相合，有些却与抄本不合而与刘绩《管子补注》本（下简称“刘本”）相同。今举《大匡》篇之例，列表如下：

	陈校底本（赵本）	陈奂所校	抄本	刘本	说明
1	召忽曰：不可	无“不”字	召忽曰：可	召忽曰：不可	陈校与抄本合
2	犹鼎之有足也	“足”作“定”	犹鼎之有定也	犹鼎之有足也	陈校与抄本合
3	与夫人皆行	“皆”作“偕”	与夫人皆行	与夫人偕行	陈校与刘本同
4	寡人愿生得之	无“之”字	寡人愿生得之	寡人愿生得	陈校与刘本同
5	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	“死臣”作“臣死”	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	公子纠可谓有臣死矣	陈校与刘本同
6	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	“及”作“反”	其反岂不足以图我哉	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	陈校与抄本合
7	异日公皆管仲曰	“皆”作“告”	异日公告管仲曰	异日公告管仲曰	三者相同
8	告管仲曰请修兵革	无“兵”字	告管仲曰请修革	告管仲曰请修兵革	陈校与抄本合
9	践坛	无“践”字	坛	践坛	陈校与抄本合
10	不修于兵革	“兵”作“其”	不修于其革	不修于兵革	陈校与抄本合
11	可游于楚	“楚”作“是”	可游于是	可游于楚	陈校与抄本合
12	则始可以施政矣	“始”作“如”	则始可以施政矣	则始可以施政矣	陈校与抄本合
13	宾胥无为西土	“土”作“士”	宾胥无为西士	宾胥无为西土	陈校与抄本合
14	食其委	“其”作“以”	食其委	食以委	陈校与刘本同
15	上而见之于君	无“之”字	上而见之于君	上而见于君	陈校与刘本同

表中所列 15 条，陈校与抄本相合者 9 条，与抄本合且同于刘本者 1 条，而另 5 条即第 3、4、5、14、15 条不合于抄本而与刘本相同。据此可知陈校所用校本绝非墨宝堂原本。此校本后有陈奂跋文：“宋本《管子》向藏黄尧翁家，旧缺自十三卷之十九卷，影钞补足。尧翁歿，尽归汪君闾源家。己丑九月，王怀祖先生属钞，乃向汪氏借录……因自过录于明刻刘绩本上。明刻错误极多，乃知宋本之足贵。今为兰邻先生之嘱，录于此本。”细审其中“因自过录于明刻刘绩本上”，则知陈奂所用的校本只是校宋本，即以墨宝堂本校刘绩本，而非为墨宝堂原本。陈奂跋所署时间为“甲午三月”，知此校作于道光十四年（1834）。此前 5 年即 1829 年，陈奂从汪士钟处借抄墨宝堂本。此时墨宝堂原本早已归还汪氏，而抄本也寄给了王氏父子。陈奂用以校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的，只能是校宋本。陈奂在校录时，凡赵本与墨宝堂本及刘本之不同处，均出校，故其校混合墨宝堂本与刘本两种版本之内容。

陈奂校本流传颇广，莫友芝、谭献、吴眉孙等均曾传录。王欣夫亦曾传录一本，并据以比较墨宝堂本与杨忱本之短长，见其《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甲辰稿卷 3。^②书中所举墨宝堂本胜于杨本之处共 39 条，多有误刘本为墨宝堂本之处。如其中所云《小匡》“五乡一帅”，“五”不作“三”；《霸言》“举大事用天心”，“心”不作“道”；《君臣上》“其大者有侵逼弑上之祸”，“弑”不作“杀”；《形势解》“主不易其则”，“则”不作“利”；《版法解》“故曰备长存乎任贤”，“任”不作“在”；《轻重丁》“天下高亦高”，不脱“天”字等，均与抄本不合而与刘绩本同。墨宝堂本不如杨本之处，书中列出 6 条，其中 4 条与抄本合，第 3、5 两条与抄本不合。第 3 条云《兵法》“无设无形焉”下脱“无不可以成也”并注 32 字，此脱误者为刘绩本，抄本并不脱。第 5 条云《侈靡》“潭根之误伐”下脱“固事之毋入”并注 20 字，此亦刘绩本脱而抄本不脱。以刘本之长为墨宝堂本之长，以刘本之短为墨宝堂本之短，此皆由误信陈校所用为墨宝堂原本所致。如无抄本作参照，则几于不可明辨。

（责任编辑：陈剑）

^①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83 页。

^②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274、1275 页。墨宝堂本为蔡潜道所刻，杨忱本刻工多为南宋初浙江地区良工，故王欣夫书中称墨宝堂本为蔡本，杨忱本为浙本。